
赵必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曾长秋¹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介绍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情况, 湖南常德的赵必振在五四前期翻译了大量作品, 积极传播社会主义, 1902—1903年, 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等二十余本日文著作, 还翻译了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 把马克思主义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赵必振一生, 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关键词】赵必振; 翻译《近世社会主义》;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5—0097—06

说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 赵必秀翻译日文著作值得大书一笔。比中国共产党成二早 19 年, 即在刚刚进入 20 世纪时, 赵必振就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上海翻译了日文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实用卫生自强法》、《社会改革论》、《新世界伦理学》、《东亚将来大势论》、《万国教育志》、《英国地方政治论》、《日本维新慷慨史》(两卷本)、《日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传奇》、《东亚女权萌芽小史》、《世界十二女杰》、《戈登将军》《亚历山大》、《拿破仑》、《土耳其史》以及“史学小丛书”9 种, 共 20 余部译作 100 多万字, 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传播到中国来。

一、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缘起

随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西学东渐”式的译书热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可是, 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不曾有真切的了解, 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真理主要是西方民主主义。由于封建王朝对外国侵略者屈服, 宣告了封建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团结御侮的武器, 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传播西学, 以为“要救国, 只有维新”^[1], 于是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 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然而, 西方列强却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 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总是行不通!

19 世纪 70 年代初, 清朝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后便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赔礼道歉, 陪同翻译张德彝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目睹的巴黎公社起义; 另有王韬写的《普法战纪》一书, 也提到了巴黎工人起义之事。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以后, 早期改良派编译了一批西书, 其中涉及“郭密尼士”(共产主义)、“康密尼人”(共产党人)等词句。由于主张“平俸给, 齐贫富”, 严复将其翻译为“均贫富之党”。19 世纪末, 梁启超也津津乐道地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 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论俄罗斯虚无党》、《圣西门之生

收稿日期: 2017-05-10

作者简介: 曾长秋 (1950-), 男, 湖南浏阳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政治学、历史学。

活及学说》、《社会主义论》等文，刊登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2]。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的《大同书》，可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更是明确地将自己的民生主义，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甚至找上门去要求参加第二国际。上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虽然最早接触并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但他们的介绍是零星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之处，其社会影响力也微不足道。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可上溯到 19 世纪末。据查证，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 1898 年基督教团体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翻译了柯卡普所著《社会主义史》，由于印数不多，影响有限。1899 年 4 月，《万国公报》第 121 期至 124 期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一文，称赞马克思、恩格斯为“百工领袖”，还介绍了“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论》者也。”此后，中国的留日学生陆续传回一些新名词和译作，使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次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3]。

1902 年至 1907 年为第一次热潮，一些在国外出版的中文刊物登载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例如：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著文，称马克思为“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03 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 12 期称：“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 年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 2 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1912 年孙中山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一文，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字义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实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办的《天义报》第一次刊登了马克思的肖像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还在《新世界》节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但是，上述人员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谈不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以及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认为提供了一条可以用于“改造中国”的途径。使传播走向高潮的是一些归国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他们相继译了《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世界六大问题》等 30 多种书籍，其中半数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以赵必振的译作时间最早、数量居多，影响也大，起到了“首传真”的作用。

1917 年至 1921 年为第二次热潮，有 30 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价格与利润》、《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还有一些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阶级争斗》、刻卡扑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也有中译本。据统计，《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新社会》、《曙光》、《建设》、《互助》、《广东群报》、《中华新报》、《劳动界》、《共产党》月刊等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十月革命的文章，有 237 篇。其中，五四运动以后成井喷之势，达 223 篇。其代表人物有：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恽代英、蔡和森、杨匏安、陈望道等。许多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的过程中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从于任何压力，也不是追逐时髦，这是他们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救民方案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经过认真思考做出的抉择。

在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中，赵必振于 1902 年就投入了战斗。无疑起了“首传真”的作用。他的译作虽然晚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译文，但李提摩太毕竟不是中国人。梁启超 1902 年刊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提到过马克思、社会主义等词汇，而且与赵必振的译作同时出现，而梁启超毕竟是只言片语，不及赵必振那 20 多本译作有分量。众所周知，在中国正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于 1918 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1919 年主编《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过在时间上却晚于赵必振 16 年。因此我们说，赵必振是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二、赵必振的翻译作品将社会主义最早介绍到中国

赵必振，字曰生，号星庵，湖南武陵（今常德市）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在一户官宦世家。赵必振的先人虽然为官为宦，却以书香传世。其先祖赵慎畛（1762—1826），清嘉庆进士，官至广西巡抚、闽浙总督、云贵总督。赵必振年轻时读书发奋，祛学政钱沅看重，后拜纪昀（纪晓岚）为师，以阮元、赛方纲为友，对古籍版本学、目录学有深研。他对三籍版本鉴赏也有独到之识，鉴藏之精，当时无人与匹。著作甚丰，有《赵慎畛杂文》、《赵文恪奏议》、《人政录》、《载笔录》、《榆巢杂识》、《读书日记》、《惜5笔记》、《蓼生日记抄》存世。其祖父赵光（1797—1865），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刑部尚书，工诗文，尤善书法。他师承董其昌，与陈孚恩、祁隽藻、许乃普并称清末四大书法家。其父赵燮和，在广东官至知府，光绪十年（1884年）死于广西怀集知县任上。赵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字“曰生”含“粤生”之意。在父亲死后，他11岁时随母从广西扶灵柩还乡，定居在老家——今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狮子山村。

赵必振在湖南长大，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读过《湘学报》，景仰谭嗣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他在戊戌变法前夕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他支持变法，与黄遵宪、熊希龄等交往甚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与湘水校经书院同窗、“寒社”社友何来保、胡友业等组织常德“自立军”，响应浏阳人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起义。由于事泄，何来保等人被捕之后押往长沙砍头，赵必振于8月21日化装成和尚逃往桂林的姐姐家躲避，在好友龙赞侯的帮助下经澳门出国，亡命日本。他参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对、编辑工作。办报之余，他用两年时间努力学习日文，旁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演讲，并收集到日本学者出版的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还与在东京的反清人士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等，多有交往，其思想与时俱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国内党禁放松，赵必振启程回国。他在上海居住了三年，从事翻译工作，留下了以下作品。

1902年8月，29岁的赵必振在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译作——翻译了日人幸德秋水1901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该书虽然只有4万多字，却是中文版第一次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甚至比列宁1916年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还早14年。该书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革命）来“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以“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来“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以上这些说法出自一百多年以前，确实是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足见赵必振翻译这部作品的“慧眼”和勇气。该书发行时引起了上海新闻出版界不小的轰动，《每日新闻》、《中国民报》以及许多社会活动家纷纷赞扬这一惊世之作。

1903年2月，赵必振又在广智书局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1902年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该书分上、下两册，正文四编约16万字。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有五章，依次介绍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勃朗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尖锐地批判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批评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有四章，为全书核心，依次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以及马克思、洛贝尔图斯、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对德意志社会主义予以充分肯定，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赞扬；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依次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明确地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依次介绍英、法、德、美以及东欧各国社会党的活动，指出各国社会党的历史并不等同社会主义史。书后附录了《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以及15个参考书目。该书出版24年之后（即1927年），上海时代书店将赵译本《近世社会主义》重印，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大革命高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4]。下面，我着重介绍《近世社会主义》这本书。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前，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主渠道在日本。日本有一批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例

如：河上肇翻译了《资本论》（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就师从河上肇学习政治经济学）、村井知至撰写了《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撰写了《社会主义神髓》、岛田三郎撰写了《社会主义概评》等。其中，以福井准造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在中国影响最大。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赵必振功不可没。赵必振翻译的中文版《近世社会主义》，不仅介绍了欧美各国社会党的现状以及社会主义学者的生平、著述，而且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为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126个文献。书中以主要篇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写作过程，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业以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还介绍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该书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称颂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5]。书中还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人类进步必然之势”，并预言“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结尾段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6]其结束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经典语言许多人耳熟能详，而这些文字的早期译本，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译文却有较大差异。在陈望道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之前，上述经典段落早在1903年由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中有四处提到了。赵必振是这样翻译的：“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之火焰。”他把结尾段文字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因为该书是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译著，赵必振还把《共产党宣言》译成《共产主义宣言》，此应为中文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一词。因此，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译作之外，赵必振还翻译了幸德秋水撰写的《广长舌》中的32篇文章，辑成一本译著。这是一部宣传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其影响力甚至比前面提到的那两部译作还要大。赵必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作，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三、赵必振翻译的具有爱国救亡作用的其他著作

赵必振的其他一部分译著，旨在总结某些国家亡国的教训。

近现代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一些爱国学者往往用其他国家亡国的历史资料作为题材，进巧爱国救亡宣传。例如，上海广智书局1902至1903年之间出版了日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1套9种），很受读者青睐。该丛书的书目分别是：《十九世纪大势略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日本现势论》、《埃及史》、《犹太史》、《腓尼西亚史》、《波斯史》、《亚细里亚巴比伦史》、《亚刺伯史》，后六种属于亡国史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允村三郎撰、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的《土耳其机史》巧成了文明古国亡国史系列。《土耳其机史》开篇写了三章，论及该国概况（包括地域、国情与形势）；正文共四编，叙述自开国至近世的历史以及该国的宗教、政治、兵制、财政、贸易、交通、文化、教育、艺术，并对其衰亡的过程与原因进行了分析。

以上著作有一个突出特点：记叙了这些文明古国是怎样由盛转衰的？译介这些与中国有类似经历国家的亡国史，更能引起国人共鸣，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奋起救亡。例如，他分析土耳其之所以亡国，其原因在于“君奢民惰，丧失了原来的尚武精神”。在《埃及史》中则指出，该国君民不知自爱、大举外债，其

患无穷：因为，“既陷破产之域，本由外债而作俑。一国之财货已全涸竭，农困于租税，官失其给俸，举国之民，流离困苦，饿莩横路，惨不忍睹：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尽为欧洲英法人所占夺。国权堕地，不可挽回，其陷于惨状苦境者，实由于财政紊乱。”^[7]这些译作问世，立即刮起了一阵飓风，极大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如何避免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则成为了国人关注的焦点。

赵必振另有一部分翻译，旨在总结日本维新变革的经验。为了借鉴日本的经验、唤起我国民众的觉醒，赵必振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该书由日人西村三郎撰，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由于原书排列无序，使读者难于了解明治维新的全过程，译者便按时间先后、贡献大小调整编派顺序。译本分两卷：上卷为佐久间象山、月照师、渡边华山等人的传记，下卷为平野国臣、岩仓具视等人的传记。译者在《叙》中评价：“其书详于我国维新之改革，文明之进步，凡有关于国步者，述其事迹，至周且详，而于爱国志士艰难奔走、躬膺刀锯鼎镬而不辞，以及时势变迁、人情隆替无不记之。”还声明：“欲求社会之进步，必不能无所改革……此天下之公理哉。”^{[8] (P1)}

从上可知，赵必振翻译此书的目的，主要是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激励我国仁人志士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译文中间还夹有按语，表达了译者的倾向性意见。例如，他在评价藤田东湖时指出：（藤田先生）“虽然意气凛凛，至今犹有生气。岂音我国之朝言攘夷大势，去即摇尾乞怜、媚外惟恐不及者，所可借为口实也。”^{[8] (P7)}以上这些议论，对启迪读者的觉悟、激发国人的斗志，亦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赵必振还有一部分译著，旨在以国外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斗志。

赵必振译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非常重视各国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用以“开民智，挽狂澜”。上海益新译社1903年出版了他翻译的日人土井晚翠著的《拿破仑》传记，就是其中一例。益新译社在《中外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对出版目的说得很清楚：“拿破仑之用兵也，兼一国即予以立宪之法，略一地即畀以自治之权法，并蒙其赐，又不独法民蒙其赐。我国今日盖亟于立宪与地方自治之制耳，吾愿爱国者各手此一编以讲求立宪之方法、自治之规模，则我国之富强、吾民之光荣于法岂多让哉！”^[9]

又如，赵必振翻译的《世界十二女杰》（日人岩崎沮堂、三上寄凤著，广智书局1903年出版），介绍了法国格儿桎、美国扶兰志斯、普鲁士王后流易设、法国苏泰流夫人等12个女性的事迹，力图证明女子的能力丝毫不亚于男子，旨在为中国女性提供榜样。赵必振还翻译了《东洋女权萌芽小史》（日人铃次郎编，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年出版），介绍泽伯爵夫人、矶精子等七十余人的事迹，旨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倡导男女平权。译者在《叙》中蚕涓：“男女同权者，古今中外之公理。”而中国目前之所以男女不平等，是因为处于“公理未发达之时代，男尊女卑之谬说，蔓延于人间。在昔野蛮之世，万国所同，而东亚为尤甚”^[10]，这个现状亟待改变——争取女性解放！

四、赵必振的晚年生活以及对其翻译作品的评价

赵必振早在青年时期，就参与了自立军、立宪派的活动，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才有在东京和上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32岁时离开上海去香港，在一家《商报》做了两年编辑，也翻译了一些日文经济新闻。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抨击英国殖民政策的文章，被港府驱逐出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旧时好友、澄迈知县龙赞侯邀请他当督学，他便去了海南岛，两年间创办了澄江、迈江两所学堂。由翻译转而从教育事，这是他教学生涯的开始。

宣统元年（1909年），赵必振应邀到沈阳做了熊希龄的幕僚。早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就与熊希龄交往甚密，此时熊希龄任奉天盐运使兼东三省财政监理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与奉天陆军协统蓝天尉通电“拥护

共和”。赵必振从营口去南京和上海，充当熊希龄与革命党的联络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熊希龄任热河都统，他随之任热河都统署财政厅的厅长。民国二年（1913年），熊希龄去北京组阁，担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赵必振入财政部主管国库。袁世凯称帝时，赵必振著文声讨而遭通缉，暂时避难于湖南，任长沙（沙）宝（庆）镇守使梅馨的秘书长。此后，他回财政部继续任职，达十余年之久，且官声极佳，被赞为“身为五长，不名一钱”。其间，他还提出了地税、国税分治的重要思想。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京政府解散之后，虽然桃源人覃振（司法院副院长）邀请他前往南京政府任职，但他无意从政，乃留在北平（即北京）以教书为业，在私立民国大学、华北大学讲授“公羊春秋”、“三礼”、“地理沿革”等课程。

1931年在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导致华北动荡不安，赵必振从北平回到湖南，居长沙六年。他先在慈善团体充任华洋义赈会的中国董事，并兼任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后重操旧业，从事教育工作。他在中和、孔道两所国学专修学校执教，将讲稿编成《国学概论》一书出版，除了收入“公羊春秋”、“三礼”等内容，还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儒学经典。1937年抗战爆发，他回家乡常德避难，仍以教书为职业，先后在常德县立中学和私立明义中学任教，艰难度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以76岁高龄的资深经历，被聘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定居省会长沙。晚年，他回首往事，笔耕不辍，撰写了《自立会纪事史料》以及一些回忆录。1956年12月，赵必振在长沙病逝，享年84岁^{[4] (p6)}。

总观其一生，赵必振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上海翻译日文版著作。仅在1902~1904年间，一人就翻译了20余部，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由张旭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库》，其中有一本《近现代湖南文化名人（翻译家传）》，第一篇就写了《翻译社会主义作品第一人——赵必振》。他从日文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作品，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文明古国亡国的历史教训，宣传了维新变革和救亡图存的思想。他以启迪民智、复兴民族为己任，携笔力耕、饱含热情，其译著对激发中国人民提高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产生了积极影响，带动了社会主义新思潮传入中国。

可是，由于他只速成地学过两年日语，翻译水平有限，再加上在上海着手翻译的时间仅三年，可谓时间短、任务重，因此译文比较草率。例如：译名不够准确，用词前后不统一，还存在一些语句欠通顺的地方等。之所以出现这些瑕疵，是因为他急于求成，通过推出一批社会主义作品和传播日本维新思想，来激发我国民众的志气，变革现实社会，故来不及详细地推敲文字、雕琢句法。然而，面对时局危难，他只得仓促上阵，使译文中出现了以上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瑕不掩瑜，读者自能明白也在译作中所蕴含的爱国热情。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 毛泽东选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1470.
- [2]曾长秋, 周含华. 中国思想通史纲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290.
- [3]张耀灿, 曾长秋.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12.
- [4]田伏隆. 赵必振传略[M]. 常德县文史资料(第3辑)[C]. 常德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印刷, 1987.
- [5]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644.
- [6][德]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58.

[7][日]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埃及史[M].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03:30-31.

[8][日]西村三郎编,赵必振译.日本维新慷慨史(上卷)[M]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02.

[9]广告.新译拿破仑[N].中外日报(上海图书馆馆藏),1903-04-09.

[10],[日]铃木光次郎编,赵必振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M].上海:上海新民译印书局,1903:1